

[DOI]10.16164/j.cnki.22-1062/c.2016.01.040

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与中国道路的开辟

——邓小平对改革开放与前30年关系的深刻揭示

彭波,郑德荣

(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在明晰前30年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成就与失误的基础上,从政治、经济、文化三方面着手,深入浅出,揭示出改革开放与前30年关系的实质,是坚持、改革与发展的关系,由此成功实现历史转变,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今天,在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论断中重温邓小平30多年前对改革开放与前30年关系的深刻揭示,让我们能够更为明确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既不割断历史,也不虚无历史,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关键词]邓小平;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改革开放

[中图分类号] A8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01(2016)01-0201-05

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习近平强调,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39},它直接产生于改革开放30多年的伟大实践过程中,也来源于新中国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习近平明确指出:“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2]18-19}。早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对改革开放与前30年的关系做出深刻揭示。他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自己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3]300}他的话表明,改革开放前30年虽未能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二次结合,但这一时期所建构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取得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为改革开放后中国道路的

开辟与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探索为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坚实基础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如何认识并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近30年的历史,是党和人民面临的十分紧迫而又重要的问题。邓小平曾强调:“这30年是值得我们回顾的,值得我们总结的”^{[4]262}。只有对这段历史做出实事求是的分析总结,我国才能结束对历史重大问题的争论,统一思想、团结一致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指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历史,总的说来,是“我们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5]92}在这30年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成功实现由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并由此开始探索中国式工业化建设道路,力图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收稿日期] 2015-11-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KS025)。

[作者简介] 彭波(1988-),男,四川成都人,东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郑德荣(1926-),男,吉林延吉人,东北师范大学原副校长,毛泽东思想研究所所长,荣誉(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分会顾问。

国情的第二次结合。

前 30 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为中国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新中国的建立使我国取得了民族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了除港澳台地区外的国家统一,彻底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社会基础,建立并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中国从此结束了蒙受屈辱、战乱频仍、四分五裂、民不聊生的黑暗历史。以这一国体为根基,我国同时建立了与此相得益彰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经济制度,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由剥削阶级统治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性转变,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创造了根本政治前提。1956 年,我国取得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决定性胜利,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同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破除了社会主义各国对苏联模式的迷信,毛泽东适时提出“以苏为鉴”,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国情的第二次结合,并进行了艰辛探索,力图探索出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积累了宝贵的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

前 30 年对中国政治体制的改革探索,为中国特色政治道路的开辟提供了理论启迪。1956 年,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开始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探索。在这一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明确指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全党的工作中心应当转向经济建设。这就要求党带领全国人民紧紧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中心任务,对新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进行稳定、巩固、调整和改革。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先后发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对社会主义社会建设提出了全新论断,他指出,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也是由矛盾不断推动向前发展的。在我国,“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6]214}是我国的主要矛盾,解决的唯一途径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7]633}。为此,就必须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在政治领域中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破解权力过于集中带来的制度性弊端。这一时期,毛泽东与中共中央在扩大民主方面做出积极尝试,提出中国共产党同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鼓励民主党派“唱对台

戏”以改进党的领导;并同时试行行政体制改革,适当扩大地方权力,实行中央与地方互相监督,同时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同在这一时期,制定较为完备的法律,建立健全的法制,成为国家工作的迫切任务之一。刘少奇还进一步设想我国逐渐完善法律体系建设,党、国家机关和个人都在法律保护的体系下运转、生活,严格遵守法律、贯彻执行法律,最终形成依法治国的状况。

前 30 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中国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明确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是新中国的重大历史任务。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基础薄弱、经济结构残缺、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这些因素让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要实现国家的富强,就必须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党的八大报告更是首次明确提出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目标要求和论断。而早在八大前,党中央于 1953 年 12 月提出了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主要任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1956 年,我国基本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全面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结构,确立了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实现了所有制的大变革。在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一基本经济制度条件下,我国通过连续四个五年计划的建设,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并在各项建设事业取得重大成就:大规模农田水利工程的建设和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工业的发展,大大改善了我国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提高了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同时,教科文卫体事业的快速发展,使我国在 30 年间培养了近九百万专门人才。邓小平对此指出,我国改革开放前 30 年在工农业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方面的成绩,使我们“有了一个向四个现代化前进的阵地”^{[4]279},《历史决议》更是明确强调:“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5]98}

前 30 年对中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探索,为中国特色经济道路的开辟提供了思想启迪。中共八大前后,针对开辟一条以苏联为鉴戒的中国式工业化道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

体对中国的经济发展结构、体制机制以及思想理念做出了有益的改革探索。针对经济发展结构,毛泽东指出,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6]240-241}。而要科学妥善处理这一问题,就必须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前提下,实行工农业并举的方针。针对经济体制,党中央在经济管理权限上着力颇多。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要充满活力,就必须同时处理好国家、企业和个人,以及中央和地方这两种关系。对这两种关系的处理,毛泽东提出了放权让利的思想,通过向地方分权,使中央与地方互相影响,既全面看到经济发展中的大局,也能看到更多的实际问题、局部问题,关心群众眼前利益,弥补中央不足。在经济理念思想方面,陈云提出“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总体设想,将市场机制引入计划经济中,开始突破苏联经济发展模式的桎梏。毛泽东更是在此后明确提出“重视价值规律,利用商品生产,发展商品经济”的命题。但受时代局限,这些改革理念没有完全跳出计划经济框架,其实践也浅尝辄止,但毕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提供思想启迪。

前30年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文化建设,不仅要适应并推进政治变革,还要适应并推进经济建设。建国初期,在重申新中国文化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基本特征,重申新中国文化发展“为工农兵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事业的同时,面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杂乱复杂局面,党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展了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树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指明了我国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中共八大前后,党中央以苏为鉴,在科学文化领域妥善地解决了党内一部分干部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和社会作用做出了实事求是的判断和估计。此后,毛泽东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一道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在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提出向现代科学进军的同时,党中央还提出“双百”方针用以指导我国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发展和繁荣。建国初期,我国一度存在用行政手段干预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现象,毛泽东对此提出了纠正意见。他指出,要尊重文艺工作者和科学研究的主体作用,不能用行政干预其独立思考

和辩论的自由,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上的百家争鸣应成为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双百”方针的提出,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服务,树立了比苏联更为自由、开放的环境,我国科学文化事业也一度呈现繁荣景象,取得可喜成果。

前30年探索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同样是开辟中国道路的宝贵财富。不可否认,前30年中,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经验不多,对于国情的认识存在主观主义的偏差,因此在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探索中经历了曲折与失误,甚至犯了全局性的严重错误。自1957年下半年开始,党对这条道路的正确探索开始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过多强调生产关系的反作用,违背经济发展规律,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党中央虽一度纠正这些错误,但并未在思想上纠正“左”的根源,阶级斗争逐渐被夸大化、绝对化,直至后来“以阶级斗争为纲”发生“文化大革命”这样全局性、长时期的错误,给我国社会发展带来惨重损失。对于这一时期的错误,党的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但必须要看到,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其过失,不能以毛泽东晚年错误否定他一生为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所做出的功绩。而对于30年中的曲折与失误,邓小平以辩证的眼光强调分清主流与支流,变坏事为好事。他认为,“文革”在提供了反面教训,促使人们认识我国的弊端在哪里,促使人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深刻反思并取得突破性认识,从而深刻总结经验教训,开启历史新航程。“总之,30年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面貌一新。”^{[4]262}无论是成功的经验或失败的教训,都是我们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珍视的宝贵财富。

二、坚持、改革、发展,开辟中国道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宣告我国实现伟大历史转折,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历史性命题。这一命题是中国共产党人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与前30年的探索实践息息相关。邓小平认为,改革开放后的相当长一个历史时期的主要任务是搞现代化建设。能否实现四个现代化,决定着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而要实现这一宏伟

目标,“主要依靠过去30年建立起来的基础和积累起来的建设经验”^{[4]220},并对不符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创新,同时也打开国门,加强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文化和科技交往。他的话表明,改革开放与前30年是有机统一的历史整体,不能将两者割裂对待。在坚持前30年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所打下的良好制度、物质、思想基础上,改革开放是对前30年已经提出但并未落实的正确主张的真正贯彻,是对错误的纠正,是对不符合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具体体制机制的革新和发展,从而真正跳出传统社会主义思维桎梏,开辟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尽管改革开放实行了与前30年不同的路线方针政策,但却并没有违背社会主义的根本方向。具体而言,邓小平领导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初期从政治、经济、文化三大领域的建设实践上体现出了他对前30年的坚持、改革与发展。

(一)政治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在指导思想,邓小平纠正了前30年很长一段时期内“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政治制度上,在坚持建国以来所确立的国体政体等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他进一步明确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3]163},从而确立了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对于具体的政治体制,针对党内一度存在的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领导职务终身制、法制建设不完善、民主缺乏制度化程序化等现象,邓小平在贯彻落实八大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积极进行改革,实现了对前30年的超越。他明确强调,没有民主有序的政治体制,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就无法被调动起来,科学的决策就无法被党和政府实施,官僚主义、个人崇拜问题就会滋生蔓延,政权就无法得到巩固,社会就无法保持稳定。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为了“发扬和保证党内民主,发扬和保证人民民主”^{[3]372-373},从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解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在提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达到的总体目标的同时,邓小平反复强调,我国的民主政治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必须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评判政治体制改革的标准,则在于看改革是否稳定国家政局,是否改善人民生活,是否发展生产力。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推动下,党严格民

主集中制,建立干部离退休制度,健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将党政职能适当分开,改善了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深化人事制度、机构改革,加强了对于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实施依法治国方略,坚持人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扩大人民民主,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增强社会自治功能,从而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二)经济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道路

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邓小平破除了前30年“一大二公三纯”的桎梏,确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并着手对弊端丛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深刻意识到,不断凸显弊端的计划经济终究会成为桎梏社会主义经济健康发展的障碍。要突破这一藩篱,就必须摒弃旧有思维,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闯出一条新路。回溯历史,中共八大前后提出的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必要补充,虽因历史条件所限,未能从根本上跳出计划经济的框架,但却为改革开放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埋下伏笔。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在八大基础上实现质的突破,破除了将经济活动手段和管理体制划归社会制度范畴的禁锢,强调:“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8]373}。此后,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与此同时,邓小平强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发展主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他以开放的心态打开国门,“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使中国走上对外开放的高速发展道路。对内改革经济体制,对外实现全面开放,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终于在改革开放后走出并不断拓展。

(三)文化上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和党中央实现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申党发展文化事业的“二为”方向、“双百”方针,确立了我国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邓小平强调,发展我国文化事

业,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科技文化建设方向;必须“坚决执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一定要坚决执行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的方针”^{[3]183};必须破除用行政方法干预科学文化发展的痼疾,尊重科技文化工作者主体作用,让科技文化问题在探索 and 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必须坚持改革开放既定国策,以开放的视野大胆吸收国内外一切先进文明成果,高速发展国民经济,实现经济、科技和文化发展的现代化。在此基础上,邓小平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他指出,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他强调:“不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8]144}。在邓小平的指引下,党对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经过不懈努力,带领我国走出了一条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凝聚和激励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力量,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它反映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政治的基本特征,又对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以巨大促进作用”^{[9]35}。

三、结 语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实践,宣告中国已经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的第二次结合,走出了一条符合本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是中华民族由沉沦到崛起,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10]21}。改革开放虽然在很多地方与

前 30 年相比体现出明显区别,但这并不是社会基本制度、国家领导力量和意识形态指导思想的区别,更不是执政党的宗旨和奋斗目标的区别。改革开放并非离开社会主义轨道进行,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总结前 30 年历史的目的,就是要让人们总结历史,结束纷争,集中精力向前看。而他对改革开放与前 30 年关系的深刻揭示,其目的则是让人们看清两个历史时期的一致性与连续性,真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什么既坚持社会主义,同时又有“中国特色”。在今天重温邓小平 30 多年前对改革开放与前 30 年关系的深刻揭示,让我们能够更为明确必须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既不割断历史,也不虚无历史;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2]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 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
- [3] 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4] 邓小平思想年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5] 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对历史的回顾[M]. 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
- [6]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7] 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 2 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8]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9]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 [10] 郑德荣,彭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基本特征论析[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4).

The Exploration of Chinese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Exploration of China's Roa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lation between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revealed by Deng Xiaoping

PENG Bo, ZHENG De-rong

(College of Politics and Law,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Deng Xiaoping had revealed the relation between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aspects, he had showed us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two era is insist on, reform and develop, thus achieve the historical changes, develop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rewarming Deng's revealing based on Xi Jinping's 'two can not deny', can let us fight against the historical nihilism, unswervingly take the road to achieve the great revival of China dream.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Reform and Opening up; 30 Years Before the Reform

[责任编辑:秦卫波]